

肯尼迪遇刺，最没悬念的悬案

一周史记

下周史上那点事儿
(11月18日—11月24日)

□本报记者 王昱

11月14日，美国新任驻日大使卡罗琳·肯尼迪正式到东京赴任。明明是大使赴任，在美日这对盟友或民间或官方的张罗下，却搞得有几分像“公主和亲”。当天，日美主要新闻网站都公布了为这位女大使特制的形象宣传片，在该片中，人们除了欣赏这位“美国宝贝”堪称坎坷的成长史，恐怕不由得会想起造成这种坎坷的“第一推动力”——1963年11月22日，卡罗琳的父亲、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约翰·肯尼迪遇刺。下周五(11月22日)刚

好是这个“20世纪最大疑案”的50周年纪念日。

肯尼迪遇刺之所以如此出名，首先是因为肯尼迪在美国的地位实在太崇高了。时至今日，每次民意调查中，他几乎都能挤进“好总统”排行榜的前五位，和他平起平坐的华盛顿、林肯、小罗斯福、里根，无一例外都任期很长并干掉了各自时期内美国最主要的敌人。肯尼迪是其中唯一一个一届没干满(只做了三年)就获此殊荣的总统。究其原因，除了肯尼迪人长得帅、口才好外，最主要的是在他的带领下，美国成功渡过了古巴导弹危机——或者说得更准确些，赢得了这场危机。正是由于肯尼迪坚强的性格和软硬兼施的高超手腕，苏联人最终在所有舰船、潜艇接受美国核查这样屈辱性的条件，从古巴撤走了所有导弹。

这样一个总统，没倒在苏联人的压力下，却在美国国内被刺杀了。更蹊跷的是，被指控为凶手的嫌疑犯案发两天后，在数百警察的看护下，被人走到跟前用手枪抵住胸口射杀，死前的遗言是“我是替罪羊”。那个杀死凶手的凶手，则自知不久于人世，一年多后死于晚期肺癌。如此一来，该案彻底成了“无头案”，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，虽然被复查了多次，每次调查组得出的结论却基本雷同：先开宗明义地承认“这很可能是一场阴谋”，然后就开始啰嗦：肯定不是苏联人干的，也不是古巴人干的，更不是恐怖分子干的……但究竟是谁干的，官方始终讳莫如深。

既然官方明显在“磨洋工”，美国民间各八卦团体就忙活了，凶手版本从玛丽莲·梦露到51区的外星人一应俱全。但要

起真正靠谱的猜测，恐怕只有一个——副总统林登·约翰逊和美国军火商。

副总统杀了总统，约翰逊杀了约翰逊，这个说法听起来有些惊悚骇俗，但思路其实非常简单，谁能从这场凶案中最大的利益呢？约翰逊当然算一个，因为总统一死他就能从原先“打酱油”的副总统接班干总统。肯尼迪任内对苏推行的是一套“和平遏制”政策，这让在二战和朝鲜战争中已经养成“发财惯性”的军火商非常不爽。相比之下，林登·约翰逊上台伊始就急不可耐地扩大越战的政策，显然“可爱”得多。肯尼迪遇刺的达拉斯市是美国军火之乡得州首府等背景，似乎也在暗暗牵起这条逻辑链。

肯尼迪遇刺至今半个世纪了，很多该案当年的保密材料被解密，但最具爆炸性的还是卡罗

琳在从政前公布的一份录音。该录音显示，卡罗琳的母亲、原第一夫人杰奎琳在案发后不久，就指名道姓地指控约翰逊和“他的南方商业伙伴”刺杀了自己的丈夫。即便如此，在司法程序严格而定罪谨慎的美国，这个说法恐怕永远只能成为一个最公开的秘密、一个最真实的假说。

肯尼迪，这位美国历史上伟大的总统，为美国人民挡住了苏联的导弹，却没为自己挡住同僚射出的子弹。他的死，成为美国另一场灾难的预演——几年后，当整个美国在越战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时，美国人用这次史上最大的信仰危机，换来了一个肯尼迪至死不悟的教训——与“敌国”在家门口架起的那几枚导弹相比，国内政治野心家和既得利益者的贪欲，对一个国家来说才是更大、更现实的威胁。

美国国安会“转正”史

在当今世界各国大同小异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(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, 一般简称NSC)被公认为该机构的鼻祖。谁又能想到，这个今天被世界各国竞相效仿的制度发明，在诞生之初其实是个标准的“小三”——在政府中责任模糊、身份未定，甚至差点被扫地出门。这个机构在美国最终成功“上位”，伴随它的是一段各方博弈的漫长过程。正是在博弈中，NSC构建了今天这套可以处理现代国家复杂安全事务的体系。

本报记者 王昱

1 苦命的战时总统

据说长大后疯狂迷恋某样东西的人，一般都是因为小时候没捞着。对美国来说，今天设计出各种制度变着花样地保障自身国家安全，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“童年有阴影”——一直到二战结束前，美国的国家安全体系都难以称得上完备。

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民主制度的试水者，美国很多制度的构思堪称完美，但偏偏在“谁来管枪”这个问题上没细琢磨——据联邦宪法规定，美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军事最高统帅，而且和很多后来的共和制国家不同，美国这个“最高统帅”是很具体的，能像真正的将军一样越级指挥每个大头兵。当然，有这样权力的国家元首在世界上也不是没有，搞一个大政府，让一批官僚帮总统忙活，基本也就齐活了。但偏偏美国的制度建设者又主张制约中央政府权力，总统带上人数有限的那帮秘书，给国家打四年临时工就得下岗。这么一弄，让美国总统理论上讲必须是个“孔夫子带腰刀——能文能武”的全才，而现实中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，所以一旦国家安全出现问题，总统就得连轴转。比如南北战争时的林肯总统，几乎吃住都能在能与前线联系的电报房内，用自己现学现卖的指挥技术跟专家罗伯特·李将军过招，直到战争结束，去歌剧院放松一下时遭到枪杀。

如果说直到南北战争时美国总统这个“最高统帅”还能勉为其难做一下的话，之后这活则干脆变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——随着世界进入总体战时代，大国之间的较量变得从陆地到海上、从枪炮到经济无所不包，战争机器一旦开动，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都会被牵扯进来。以二战为例，在战争结束前，小罗斯福总统共设立了近20个用于协调政府、海军部和战争行动的主要机构，但这些机构的主

席都没有决策权，各方之间一闹矛盾，官司就往白宫打。被尼克米兹和麦克阿瑟等一干人等吵烦了的罗斯福，逐渐认识到看似各行其是的各部门，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其实是紧密联系的，需要密切合作。他的幕僚此时提出了战后成立一个统一协调机构的想法，立刻获得了他的首肯，这种想法后来被写入了被称为“美国国家安全基石”的“埃伯斯塔特报告”中。但罗斯福没能看到这个宏愿实现，在二战即将结束时死在了任上，死因是突发脑溢血——经常加班者的职业病。

2 海军部长“复仇记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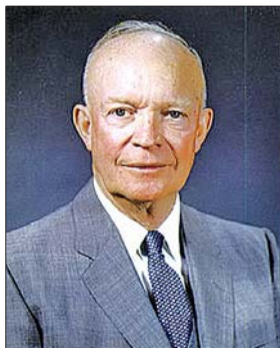
罗斯福死后，副总统杜鲁门接手了这个“把大家请到一起来吵架”的任务。也许是吸取了前任累死在任上的前车之鉴，该计划在其任期内推进速度很快。至1947年，《国家安全法》在国会通过，旨在对政治、军事、外交、内政、经济、情报等分立的职能领域和部门实施集中统筹的NSC正式成立了。

然而讽刺的是，从NSC成立那一天起，它在杜鲁门政府中就坐稳了“冷板凳”。不仅没人——其专职人员只有执行秘书及其助手，其他工作人员由三个军事部门和国务院选派，而且缺钱——财政预算仅20万美元，甚至连管啥也不知道——杜鲁门把法案中可由NSC负责的活分给国务卿、国防部长和国务院。

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，具体推动该机构设计的是身为海军部长的詹姆斯·福莱斯特，此公跟其领导想的完全不一样——在他提出的NSC构想中，该机构是一个制度化的决策组织，总统一切有关国家安全的决定都应在会议上与各方商讨后再决定，这等于要求总统与主要外交国防官员分享权力。杜鲁门等的本是个“帮手”，却发现拿到一个“金箍”，心里当然老大不愿意，在NSC第一次开会时就黑着脸强调了句：“这是我的会议！”之后就经常借故不召开会议，再到后来，则干脆把NSC主席一职推给了国务卿。如果不是朝鲜战争



2009年3月，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开会。



艾森豪威尔



肯尼迪

爆发，杜鲁门是否还会想起自己政府里有这么一个“小三”机构，着实是个未知数。

福莱斯特创设NSC的思路，其实反映了美国军界不少人的想法。他们觉得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太大，难以完成，解决之道应是缩小总统的权力，别让总统动不动就搞越级指挥，说增兵

就增兵，说裁军就裁军。从南北战争时代林肯给前线随便拍电报开始，美国军界其实就对这种行为憋了一口恶气，如今总算以“替总统帮忙”的名义发出来了。NSC因此曾被戏称为“福莱斯特的报复”——其实，这是整个军队官僚系统对过大的总统权力的报复。

3 从台前到幕后

杜鲁门的整个任期内，曾被寄予厚望的NSC都被有意冷落，但这种情况到了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。NSC从杜鲁门眼中的镣铐，在艾森豪威尔那里一下变成了智囊。

艾森豪威尔对NSC改革的思路说来其实也简单，杜鲁门时代的NSC之所以成为各部门“分蛋糕”的场所，是因为与会人员的个人命运前途还要由原来单位说了算，这造成了他们对于国安会毫无归属感，只能成为原单位利益的代表。艾森豪威尔的解决方式是转变与会者的身份，他们不再是各个部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，而是在人事上直属国安会。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微小转变，其结果是让国安会从原定设计中的“协商会议”一跃成为帮总统决定政策并传达决策的“小国务院”。实际上，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，美国政府形成了一个“决策山”的层级体系，NSC作为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主要机构被置于顶层，包括国务院在内的各部门则成了只负责具体执行的机构。借着NSC的帮助，艾森豪威尔站上

了“决策山”的权力之巅。

艾森豪威尔的改革虽然让NSC实现了“总统帮手”这一功效，其协调各部门矛盾的本职却被忽略了。如何解决“众口难调”的问题，如何协调各个部门的观点、建议和利益，这些问题都留给了他的继任者肯尼迪。

肯尼迪做出的修改是：一方面，弱化NSC作为一级决策机构的正式性，相比于艾森豪威尔正襟危坐式的NSC会议，肯尼迪更倾向于在各种非正式的“早餐会”上会见NSC的幕僚，以朋友而非上级的方式与其商讨政策。另一方面，他加强了国家安全顾问的职权，让其牵头成立了白宫局势研究室(situation room)，负责协调各部门意见，在综合汇总后为总统本人提议。肯尼迪创设的这套习惯，日后逐渐被美国历届总统沿为惯例。NSC在经历了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显赫之后，逐渐转入幕后，作为总统私人的“顾问班底”，间接决定了美国政治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NSC虽然经历一系列改革后基本定型，但每一届总统对它的定位却都稍有不同，始终在“顾问机构、决策机构、协商机构”这三个维度间游移。这种刻意制造的模糊其实可以被看做一种政治艺术。本来，对于国家安全这样事关存亡的大问题，交给一人决断则千头万绪难以处理，交给一群人争论则很容易各怀己见莫衷一是，在两者之间反复摸索和博弈，最终得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，这或许是NSC的成长史给人们最大启迪，也是改革者应有的智慧。